

# 缅北蒋军撤台与蒋介石“反攻大陆”： 台湾与美国的分歧和妥协

范宏伟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

**摘要:** 1950年初,2000余名国民党军先后败退撤至缅甸北部。随后,在台湾、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实力逐渐壮大,成为台湾试图“反攻大陆”的一支“偏师”。但是缅北蒋军不仅未能完成其使命,反而因其带来的诸多影响导致美国改变对蒋军的态度,迫使台湾两次从缅北撤军。缅北蒋军问题反映了台湾与美国的不对称依附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美台关系中的相互利用又相互制约的双重特征。

**关键词:** 缅甸;国民党军;台湾;美国

**中图分类号:** D83/87.33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2)02-0078-08

---

1949年标志着中国内战的基本终结、国共政权的易手,同时也揭开了国民党“反攻大陆”梦想的序幕。冷战时期,国共两党除了在台湾海峡不断对抗以外,还在西南边陲地区延续着类似的角力。1950年初,国民党李弥第八军和余程万第二十六军残部2000余人先后败退撤至缅甸北部。随后,在台湾、美国中情局的支持下,实力逐渐壮大,成为台湾试图“反攻大陆”的一支“偏师”。然而,缅北蒋军不仅未能完成“反攻大陆”的使命,反而因其带来的诸多影响导致美国改变对蒋军的态度,迫使台湾两次从缅北撤军。美台在缅北蒋军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不仅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美台关系的特征,而且揭示了二者在反共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

## 一、缅北蒋军问题的缘起与影响

初到缅甸的蒋军生存困难,疲于奔命,台湾当局对其也未寄予厚望。1950年中,缅甸通过美国要求台湾撤军时,台湾外交部门电令驻泰大使馆就近协助,计划在当年8月23日前撤离缅甸。<sup>[1]</sup>但是,不久缅北蒋军的命运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发生了转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中情局的“政策协调办公室”提出一个计划,援助缅北蒋军进攻云南,藉此分

---

收稿日期: 2012-02-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周恩来与中缅关系: 以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为基础的研究”(10YJC770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范宏伟,男,河南南阳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散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兵力。该计划虽然被中情局局长史密斯否定,但得到了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因此,从1951年初被称为“白纸方案”(Operation Paper)的援助缅甸蒋军的计划开始秘密实施。

中情局利用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通过两家挂名公司,从台湾和冲绳向泰国运送武器和补给,再由泰国转交给蒋军。美国工程师还帮助其在缅北孟撒修建了可供四引擎飞机起降的机场。从1951年9月开始,美国每月向缅北蒋军提供75000美元的援助。<sup>[2]</sup>

1950年8月,李弥来到缅北,整顿蒋军,大量收编当地和云南逃到缅甸的各种游杂武装和反共人士。1951年3月,台湾授予缅北蒋军“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番号,兵力扩充至6900人左右。<sup>[3]</sup>这样,初期境遇窘迫、数量有限的缅北蒋军,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峰回路转,开始日益壮大。

缅北蒋军在得到美国装备的补充和对部队进行整编后,开始对云南发动了系列攻击。1951年5月15日,李弥部队6000多人,分成4路进入云南,先后占领耿马、孟连、勐海、镇康等县的部分地区,后被击退。7月中旬,李弥部队兵分两路再次进入云南,一度占领孟连和澜沧县城,但仍被解放军驱出境外。1952年2月,台湾空运700多名军官和情报人员到缅北,3月李弥组织1000多人入侵云南,仍以失败告终。

缅北蒋军在组织几次较大规模的反攻活动相继失败后,转而采取以小股武装对云南边境地区进行袭击、破坏活动。例如,仅1952年上半年,其小股武装对腾冲、龙陵、镇康3县边境地区袭扰60多次,杀害区、乡干部和群众100多人。<sup>[4]</sup>缅北蒋军除了对大陆的西南安全造成威胁以外,还对缅甸的主权、国家安全和中缅关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蒋军军纪涣散,抢劫缅甸村庄,在当地日益引起怨恨,并向当地叛乱者出售武器。<sup>[5]</sup>从1950年开始,蒋军同当地马帮合作贩运鸦片,几乎控制了缅甸90%的贩毒生意,直到1961年撤军为止,鸦片成为其在缅甸赖以生存的主要因素。<sup>[6]</sup>

对于缅北蒋军问题,缅甸政府最初试图通过3个渠道谋求解决:第一,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第二,通过与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帮助,使其从缅甸撤军;第三,依靠缅甸自己武力解决。缅甸认为在3个方案中,第一个似乎最容易,但担心:(1)台湾否认其与缅甸蒋军有关系,称其只是国民党军的逃兵;(2)台湾声称缅北蒋军实际是中共士兵化装而成的;(3)中共会密切关注该问题,将其提交联合国会引起中国的敌视,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sup>[7]</sup>所以,尽管从1950年开始缅甸就声称要将蒋军问题提交联合国,但由于存在上述这些顾虑,直到1953年3月,仍未正式向联合国提出控诉,主要实施的是第二和第三种方案。

1950年下半年,缅军对蒋军发起数次进攻,结果不仅未能以武力解决,相反后者势力越来越大。1951年夏天,蒋军兵力增加至1.2万人之多<sup>[8]</sup>,1953年1月达到1.85万人左右<sup>[9]</sup>,控制了缅甸北部南北长530公里,东西宽280公里的区域。<sup>[10]</sup>更为严重的是,蒋军还同叛乱的少数民族武装合作,共同对付缅甸政府。1952年,缅北蒋军支持掸邦土司对抗缅甸政府<sup>[11]</sup>,“与掸邦反政府武装苏昆色部勾结,积极支持苏部攻击萨尔温江以东的缅军,阻挠掸邦土司向缅政府交出政权的计划”。<sup>[12]</sup>1951年底,蒋军开始向反政府组织克伦国防军出售武器。1952年底,蒋军越过萨尔温江向西扩展,同当地的克伦族武装进一步合作。1953年2月,二者开始联合作战,袭击了缅甸多个地方,甚至一度打到距仰光不足10英里的地方。<sup>[13]</sup>1953年2月4日,缅甸外长会见美国驻缅大使时,告诉其缅军同蒋军的战斗分散了对付其他叛军的努力。蒋军正在帮助克伦族武装,和其他叛乱组织用武器交换粮食。<sup>[14]</sup>

缅甸方的抱怨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当时缅甸的实力情况是“军队数量少、缺乏训练、装备差。缅甸陆军,包括正规的和辅助军种总共约有43000人。”“缅甸政府没有足够的兵力控制边疆地区”。<sup>[15]</sup>因此,为了武力解决缅北蒋军问题,缅甸不得不分散其有限的兵力来对付蒋军,从而使得其他反政府武装赢得喘息机会,趁势进一步发展。

此外,缅北蒋军还试图制造边境冲突,以使中缅两国军队交火,离间中缅关系。<sup>[16]</sup>缅甸政府认

为 缅北国民党部队对云南的军事行动不是真的为了“反攻大陆”,而是要破坏缅中关系。<sup>[17]</sup>因此,缅甸越来越担心中国以消灭缅甸的国民党部队为由侵入缅甸。为此,一方面,1950年6月缅甸请印度出面劝说中国不要进入缅甸,给其一些时间去解除蒋军武装。另一方面,请求美国政府帮助解决该问题。<sup>[18]</sup>应缅方要求,美国的确开始不断向台湾施加压力,要其下令从缅甸撤出军队。1950年8月,缅甸总理吴努同美国驻缅大使会谈时,对美国的努力“深表感谢”。<sup>[19]</sup>

但事情远没有缅甸预想的那样简单,尽管美国不断催促蒋介石撤军,但台湾不仅虚与委蛇,而且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通过美国解决蒋军问题的愿望屡屡落空和缅北蒋军的实力和威胁越来越大,1953年初吴努公开表示,如果他不迅速采取措施,他的政府可能会倒台。<sup>[20]</sup>为此,缅甸政府采取了两大措施。第一,1953年3月17日,缅甸通知美国从当年6月30日开始,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缅甸此举既是对美国在蒋军入侵缅甸中的作用表示不满,又是为随后向联合国控诉作准备,应对国内反对派的压力。<sup>[21]</sup>第二,1953年3月25日,缅甸向联大第七次会议提交了“缅甸联邦关于台湾国民党政府侵犯缅甸的控诉”案,要求联大建议安理会谴责台湾对缅甸的侵略行为,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使其立即停止该项行为。<sup>[22]</sup>最后,联大通过决议案,对缅北局势表示遗憾,谴责“外国军队”出现在缅甸领土上和其对缅甸的敌对行为,并宣布他们必须被缴械和同意接受拘留,或立即离开缅甸。<sup>[23]</sup>

## 二、缅北蒋军第一次撤台(1953-1954)

台湾曾就蒋军是否撤离缅甸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国民党“军事当局反对命令李弥撤出缅甸,也反对命令他们向缅甸政府屈服而被解除武装。”<sup>[24]</sup>此外,缅北蒋军也强烈反对撤离。所以,从1950年开始,虽然美国多次向台湾施加压力,要求其下令从缅甸撤军,但是台湾一直抵制美国的压力,拒绝撤军。

美国在缅北蒋军问题上的态度在1951年底前后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对随后蒋军撤台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950年11月,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中情局秘密支持缅北蒋军的“白纸方案”,同时其指示有关该计划的情况不要告知美国的外交高官们,包括美国驻缅大使。<sup>[25]</sup>直到1951年11月,美国驻泰国和缅甸大使馆才从英国人那里获知此事。<sup>[26]</sup>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在缅北蒋军问题上出现了自相矛盾、表里不一的做法。一方面,秘密支持蒋军,另一方面尚不知情的国务院又不断催促台湾撤军或缴械,并向盟友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政府没有参与缅北蒋军一事。<sup>[27]</sup>1951年底,杜鲁门已经确信缅北蒋军对美国的遏制政策更多是一个威胁而不是有益的工具,所以决定让蒋军撤出缅甸。<sup>[28]</sup>1952年1月,中情局停止了对缅北蒋军的援助。

从1950年开始,美国应缅甸要求,就不断同台湾交涉,希望台湾“明察利害,立即采取措施,命令滞缅蒋军接受缅甸当局解除武装”<sup>[29]</sup>,并承诺缴械的蒋军会受到缅甸的善待,愿意向撤军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包括运输船只和费用;愿意向台湾提供新的武器装备,以补偿其因为撤退而交出或无法带走的武器。<sup>[30]</sup>然而,台湾当局不为所动。但是,随着缅北蒋军问题的日益恶化,特别是缅甸停止接受美国援助和向联大提出控诉后,美国的态度也日趋强硬。1953年3月21日,美国驻台代办蓝钦告诉蒋介石,如果不将李弥部队撤出将会影响到美国对台的援助。<sup>[31]</sup>5月,美国警告台湾如果不撤军将会危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sup>[32]</sup>此外,这一时期美国高层开始直接介入。1953年3月12日,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同宋美龄就蒋军撤台问题进行了详谈,3月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与宋会晤时,向其表示了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同年9月29日,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见蒋经国时,提出“希望蒋总统尽一切可能把中国军队撤出缅甸……倘若‘中国政府’能撤出全部军队,那将使美国摆脱困境。”<sup>[33]</sup>9月28日,艾森豪威尔就缅甸撤军问题亲自致信蒋介石,“我确信

如要彻底解决此问题,则现在已经到了必须产生一些具体结果的时刻,”希望蒋介石下令撤出缅甸的部队。<sup>[34]</sup>

因此,在美国的压力下以及台湾基于对李弥部队处境的考虑,1953年11月7日-12月8日、1954年2月14日-3月21日、5月1日-9日,台湾分3批从缅北共撤出蒋军6986人,交出武器1323件,其中822件运回台湾。<sup>[35]</sup>

### 三、缅北蒋军第二次撤台(1961)

蒋军第一次撤台后,坚持留在缅甸的蒋军仍有6000多人,大部分武器还在他们手中或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手中。1954年9月,台湾授予未撤部队“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的新番号,任命柳元麟为总指挥。1957年12月到1958年10月,蒋军在缅北实施“安西计划”,训练游击队突袭大陆西南地区。1960年7月,台湾空运400多人的特种作战大队以及大批武器装备至缅北,扩充蒋军实力。9月,建成孟帕了机场,企图将缅东北地区建成“反攻大陆”的前哨基地,到11月,其兵力增至9400多人。<sup>[36]</sup>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缅北蒋军实力的重新扩张,使北京忧心忡忡,多次同缅方交涉,要求其消灭蒋军。但缅方一直未能通过武力解决该问题。不过这种状况不久由于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迎来了转机。1960年10月,两国签订边界条约后,双方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防止国民党部队破坏勘界,商定11月20日左右采取共同行动清除缅北蒋军。1960年11月22日-1961年2月9日,解放军两次出境作战,历时近3个月,同缅军联合围剿缅境内的蒋军,捣毁其总部,协助缅甸收回蒋军占据的30多万人口、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蒋军大部被迫撤往老挝和泰国境内。

1960-1961年中缅两国的联合军事行动除了取得上文所提到的成果以外,还产生了更深远和复杂的影响,导致蒋军第二次撤台。1月26日,缅军在攻克蒋军的肯莱和孟帕了机场后,缴获了大量新式美国武器和装备。2月15日,缅甸战机在驱逐一架向泰缅边界附近蒋军空投补给的飞机时被击落,飞行员丧生。缅甸政府披露上述消息后,缅甸国内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缅甸全国各地相继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反美示威游行,抗议美国支持台湾侵略缅甸,其中以仰光的规模最大。2月20日,近1万人在美国驻缅大使馆前抗议示威,一些示威者围攻美国大使馆,损毁了其部分财物。

2月22日,缅甸代理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强烈抗议台湾飞机侵犯缅甸领空,并指控美国向缅北蒋军提供大量新式武器和装备。吴努在3月13日的议会发言中确认,缅甸政府除了向联合国之外,还向美国提出了最高级别的抗议,批评如果不是美国向台湾提供大量援助,国民党就不会在台湾生存下去,也就不会有缅甸的蒋军问题。<sup>[37]</sup>

中缅两国围剿蒋军的联合军事行动让缅甸掌握了美国支持缅北蒋军的大量直接证据,导致美缅关系恶化和缅甸国内反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缅甸政府利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向美国施压。美国认为缅甸国内围攻美国大使馆和民众的反美示威游行是缅甸政府煽动的。<sup>[38]</sup>2月21日,美国大使馆遭到围攻后,美国务院当天立刻召见缅甸驻美使馆一秘,就仰光爆发的反美示威表示“极大的失望”,对缅甸政府允许示威表示“严重关切和失望。”<sup>[39]</sup>

同第一次蒋军撤台前后的美缅关系相比,此次情况更为严重,美国对缅北蒋军问题所引发的危机更为忧虑。1951年底,美国转变对蒋军问题的态度很大程度是由于担心中国借此入侵缅甸,损害其在东南亚实施对华的遏制政策。1960-1961年,解放军入缅协同缅军围剿蒋军,还是让美国一直担心的状况出现了。而且,败退至老挝的蒋军试图介入老挝内战,进一步加深了其对中国可能

入侵老挝的忧虑。<sup>[40]</sup>因此,美国对台湾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除了不断告诫台湾立刻停止支持蒋军和提供武器,立即将其节制的蒋军撤回台湾以外,美国还威胁将部分停止对台军事援助,不再为其训练特种作战部队和在“反攻大陆”上进行合作。<sup>[41]</sup>1961年2月,美国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警告台湾如果不撤军,当其处于困境时将会严重损害美国向台湾提供有效的政治帮助。<sup>[42]</sup>所以,在美国的强硬压力下,台湾很快承诺将所属蒋军撤回台湾。1961年3-5月,柳元麟总部和主力4521人被撤往台湾。<sup>[43]</sup>

#### 四、分歧与妥协

尽管美、台反共的方向是一致的,但二者的政策目标和利益有较大的差异和不同。蒋介石的最大目标只是推翻中共在大陆的统治,而对遏制大陆和分化中苏都不感兴趣。<sup>[44]</sup>台湾将缅北蒋军视为“反攻大陆”的重要潜在力量,所以一直力图保持这支力量,其中以蒋介石和台湾军方的态度最为坚决。尽管李弥部队多次进攻云南失败,但是台湾对其并未丧失信心,认为“从军事观点看,在目前情况下李弥部队的作用不大。然而从长远来看,一旦台湾向大陆发起总攻,这些在中国西南角的部队将成为有助于分散共产党统帅部注意力的力量;如果他们现在撤出,将来就很难派进大批部队”。<sup>[45]</sup>因此,缅北蒋军的存在实际上是台湾“反攻大陆”的决心和希望的象征,让台湾当局下令从缅北撤军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政治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当美国一再要求蒋介石下令撤出缅甸的蒋军时,他曾抱怨“美政府一方面要我反共,一方面又要我把反共之李部撤回,是何道理?”<sup>[46]</sup>其实,该“道理”就在于,台湾的反共旨在实现“反攻大陆”,美国的反共是围堵中国、遏制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而不是武力推翻中共在大陆的统治。

冷战时期,美国对台政策的选择和制定直接体现在对华关系和地区安全两个层面。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将其作为西太平洋岛屿防御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和反共基地来围堵中国。在美国实施这一战略目标时,其对台政策的定位是防御性的和威慑性的,而非进攻性的,这一点清晰地反映在1954年12月2日双方签署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中。该条约明确了美对台的协防责任,同时也对后者“反攻大陆”的行动进行了控制和约束。<sup>[47]</sup>这一条约很清楚地表明,美国意在既防止大陆武力解放台湾,也试图遏制蒋介石“反攻大陆”。美国不愿因为蒋的反攻计划卷入中国内战,同中共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所以,当台湾不断向美国表示李弥部队的存在对其“反攻大陆”和反共具有如何重要性时,是不可能赢得美国首肯的。首先,美国中情局最初支持缅北蒋军的出发点是分散中共在朝鲜半岛的兵力,属于权宜之计,而非真的要帮助蒋“反攻大陆”;其次,李弥部队的表现让美国认为,无论是作为“反攻大陆”的游击核心力量,还是“作为防止共产党南下东南亚的堡垒。但事情已经证明,其都没有这个能力和作用”。<sup>[48]</sup>1961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就曾明确表示,在缅北蒋军问题上,美台双方存在根本的利益差异:“蒋军的存在将不断给中共提供机会来直接或间接干涉缅甸,对美缅关系产生不利影响,妨碍美国东南亚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推动、扩大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应对中共的威胁。然而,对于台湾特别是蒋介石来说,缅甸蒋军是其反攻大陆的桥头堡。”<sup>[49]</sup>

台湾还是美国远东地区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维护亚太地区资本主义体系稳定与安全的一环,服务和服从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在该地区扩张的目标。在美国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其一个重要的假设或前提是认为中共会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扩张,从而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缅北蒋军问题带来的影响正是与美国这一目标和利益相违背的。首先,美国认为缅甸是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缅甸政府是反共的,而缅北蒋军问题危及该政权的存在,因为“缅共借口李弥部队在缅甸,强烈要求组成联合政府,以应付局势。”“如果容许共产党进入政府,那就意味着非共产党政府

在缅甸的结束 缅甸就会沦于共产党统治之下。”<sup>[50]</sup>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于美国努力争取缅甸继续站在自由世界这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真正的阻碍。”<sup>[51]</sup> 其次 从军事角度看,“缅甸蒋军的存在 军事上没有好处 反而会被共产党所利用。”缅甸不得不分散兵力同蒋军作战 这正在减弱其击败国内共产党叛乱和克伦族武装的努力。如果这些叛乱者重新收复失地 缅甸国内的稳定将受到危及。“我们认为缅甸的稳定对于东南亚的安全至关重要。”<sup>[52]</sup> 再次 在美国遏制东亚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中 缅甸是其防止“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重要的一张。美国认为“如果缅甸和印度支那能抵制住共产主义 我们就可能拥有整个东南亚。如果缅甸或者印度支那任何一个陷落 暹罗将步其后尘; 东南亚实际上就无法抵挡共产主义的洪流。”<sup>[53]</sup> “从战略上来说 一个非共产党执政的缅甸对于整个东南亚的安全极其重要 特别是对于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的盟友——缅甸两翼的巴基斯坦和泰国……尽一切努力确保缅甸国内的稳定 维护政治经济稳定 使共产党无法通过发动侵略以外的方式就能控制这个国家。”<sup>[54]</sup>

总之 华盛顿认为缅北蒋军问题是对东南亚地区“和平和安全极为重要的问题。李弥部队在缅甸在军事上不起任何作用。只要他们还在那里 缅甸共产党就会继续煽动其他集团要求成立联合政府 这自然会激怒缅甸当局。如果中国共产党利用它作为入侵缅甸的借口 那些对缅甸以及对自由世界事业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sup>[55]</sup> 缅北蒋军的存在违背了美国的利益 因此华盛顿才不断向台湾施加压力要求其撤出李弥部队。

台湾最终向美国妥协 先后将缅北蒋军两次撤台 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美台关系的不对称性。无论是台湾的生存与发展 还是其“反攻大陆”目标的最终实现 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这种不对称性 意味着台湾在缅北蒋军问题上的利益不得不服从于美国的利益考量。但另一方面 虽然台湾依附于美国 但其在后者的远东反共战略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也使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受到台湾当局的反限制。这一点正如美国在讨论采取何种措施迫使蒋介石就范时所言,“现实中 我们制约台湾的杠杆有限。台湾对于我们遏制中共的扩张战略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任何对台湾的重大制裁 如大量减少对台军事援助 会使得这种做法充满危险 也会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sup>[56]</sup> 美台关系中的相互利用又相互制约的特征 决定了美台双方在撤军问题上的交涉是一个复杂和困难的过程 也是蒋介石能多次无视美国的撤军要求 反对、拖延撤军 在该问题上讨价还价的重要原因之一。

#### 注释:

- [1] 周琇环《战后外交部工作报告(1950-1953年)》,台北:国史馆,2001年,第34页。
- [2] 曾艺《滇缅边区游击战史》(上),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64年,第61页。
- [3] 《云南省志》卷49,《军事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84页。
- [4] [9] [36]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73、373、375页。
- [5] “The Ambassador in Burma (K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5, 195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Asia and the Pacific, Part I, Vol. VI, 1951,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 288.
- [6] 段承恩《从口述历史中滇缅边区游击队与鸦片、马帮之关系》,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2004年第36期。
- [7] [16] *Kuomintang Aggression against Burma*,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Government of The Union of Burma, 1953, p. 1, 159.
- [8] [22] 《立法院第12会期施政报告》,《台湾国史馆档案》,目录号:069 案卷号:150 档号:11-4-3。
- [10] 《云南省志》卷56,《公安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第300页。
- [11] 覃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101页。
- [12] 《溃逃缅甸的蒋介石军队情况和缅甸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5-00605-02。

- [13] Robert H. Taylor, *Foreign and Domestic Consequences of the KMT Intervention in Burma*, Data Paper: Number 93, Southeast Asia Program Department of Asian Studi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July 1973, p. 16.
- [14] “The Ambassador in Burma (Sebal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4, 1953, *FRUS*,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Part II, 1952-1954, Vol. XII,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p. 51.
- [15] “Memorandum by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ugust 1, 1951, *FRUS*, 1951, Part I, Vol. VI, p. 281.
- [17] Kenneth Ray Young, *Nationalist Chinese Troops in Burma—Obstacle in Burma’s Foreign Relations: 1949-1961*, New York University, Ph. D., thesis, 1970, p. 57.
- [18]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ear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African Affairs (Hare)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usk)”, July 1, 1950, *FRUS*, 1950, Vol. V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 244.
- [19] “The Ambassador in Burma (Ke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5, 1950, *FRUS*, 1950, Vol. VI, p. 250.
- [2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27,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I, p. 60. Note. 3
- [21] 《周恩来总理接见缅甸政府劳动考察团谈话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5 - 00110 - 01 (1)。
- [23]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53*, New York: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United Nations, 1954, p. 168.
-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9分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1页。
- [25]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CIA Complicity in the Global Drug Trade*,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Chicago Review Press, 2003, p. 166.
- [26] [27] “Memorandum by the Special Assistant for Mutual Security Affairs (Merchant)”, November 28, 1951, *FRUS*, Asia and the Pacific, Part I, Vol. VI, 1951, p. 317.
- [28] Victor S. Kaufman, “Trouble in the Golden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the 93rd Nationalist Division”, *China Quarterly*, No. 166 (June 2001), pp. 443-444.
- [29] 《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4 - 75页。
- [30] [33] [45] [50] [55] 《顾维钧回忆录》第10分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5 - 57、400 - 401、405、211、57页。
- [31] “The Charge in Republic of China (Ranki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1,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I, p. 79.
- [32]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May 28,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I, p. 109.
- [34] “President Eisenhower to President Chiang Kai-shek”, September 28,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I, pp. 152-153.
- [35]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54*, New York: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United Nations, 1955, pp. 53-54.
- [37] 《吴努在国会谈国民党残匪侵缅问题》，《人民日报》1961年3月16日。
- [38]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Burm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31, 1961, *FRUS*, 1961-1963, Vol. XXIII,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4, p. 100.
- [39]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Burma”, February 21, 1961, *FRUS*, 1961-1963, Vol. XXIII, Southeast Asia, pp. 95-96.
- [40]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4, 1961, *FRUS*, 1961-1963, Vol. XXIII, Southeast Asia, p. 86.
- [41]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 February 20, 1961, *FRUS*, 1961-1963, Vol. XXIII, Southeast Asia, pp. 92-94.
- [42]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22, 1961, *FRUS*, 1961-1963, Vol. XXII, p. 12-13.

- [43] 《滇缅边区风云录——柳元麟八十八回忆》,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6年,第275页。
- [44] John W. Garver, *The Sino-American Alliance: Nationalist China and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in Asia*,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 84.
- [46] 覃怡辉《李弥部队退入缅甸期间(1950-1954)所引起的几项国际事件》,载《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台湾)2002/2003(14/4)。
- [47]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November 23, 1954, *FRU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in two parts)* Volume XIV, Part 1, 1985, p. 929.
- [48] “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Allison)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Bruce)”, January 9,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I*, p. 43.
- [49]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 February 20, 1961, *FRUS, 1961-1963, Vol. XXIII, Southeast Asia*, p. 91.
- [51]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February 27,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I*, p. 60.
- [5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on China”, July 28, 1950, *FRUS, Vol. V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1950*, p. 246.
- [53] “Policy Statement Prepared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16, 1950, *FRUS, Vol. V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p. 244.
- [54] “Outline Plan by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2. 27,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p. 90.
- [56]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Kennedy”, February 20, 1961, *FRUS, 1961-1963, Vol. XXIII, Southeast Asia*, p. 94.

[责任编辑:邵 鸣]

## **KMT Troops’ Withdrawal from Burma and Chiang Kai-shek’s “Reconquer the Mainland”: Divergence and Compromise between Taiwan and US**

FAN Hong-wei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In early 1950, about two thousand KMT soldiers retreated into North Burma altogether. Under the support of US and Taiwan, it became an importantly potential force of Taiwan’s strategy of “Reconquering the Mainland”. But the KMT troops in Burma failed to accomplish its mission and Taiwan had to withdraw it to Taiwan in twice under American pressure because it run against US interests in Burma and Southeast Asia. This event reflected Taiwan’s dependence on US, as well as interacting between both, the dual character of Taiwan-US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Key words:** Burma, KMT Troops, Taiwan, US